

供给经济学

理论与中国视角

白让让◎著



SUPPLY-SIDE ECONOMICS

Theories and China's
Perspectives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供给经济学

理论与中国视角

白让让◎著

SUPPLY-SIDE ECONOMICS

Theories and China's
Perspectives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供给经济学:理论与中国视角/白让让著.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32-2661-6

I. ①供… II. ①白… III. ①供应学派-研究 IV.
①F091.3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618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高静芳

供给经济学

——理论与中国视角

白让让 著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189,000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661-6/F·956

定价:42.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价值链不对称嵌入情境下本土轿车企业优化纵向组织结构战略研究与应用”（批准号71372114）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本土轿车制造企业自主产品开发的多案例比较研究”（批准号12YJA630003）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术成果出版基金
共同资助

现实挑战与理论困境(代序)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在需求侧三驾马车拉动被认为失效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转变为政策重点。白让让基于其十多年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之经验,在系统整理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供给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命题和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并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展开研究,为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建议,对于当下的学界研究和政府政策制定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本人的研究领域并非宏观经济学,受白让让之托为本书作序,实有勉为其难之感。但本人始终密切关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动态,且特别关注中国宏观经济这些年来演化和相关的理论纷争,而在数十年的教学与科研中也产生诸多困惑与思考,不妨借此机会求教于大家,或可引发出于不同视角的讨论和批判,有利于推进学术繁荣与学科的进步。

谨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中国经济学的困境

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简而言之,应该是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该能够用以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种种现象给出有效的解释,也应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而要求中国经济学也由计划经济学向市场经济学“转型”。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经济理论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而大量的政策制定则主要以苏联的计划经济政策为借鉴。1978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经济学被真正引入,不仅被借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奉为理论主桌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在此意义上,中国几乎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经济学的主导方向是将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实践,将其“本土化”,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然而,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之源,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也因当下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而处于困境之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40余年之后的经济滞胀又引发出供给经济学派,宏观经济学本身及其各种学派的诞生均源自现实经济未如已有理论预期的重大变化。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演变,直至所谓“安倍经济学”的负利率政策和英国“脱欧”引发的市场动荡,都对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现成的经济理论似乎都已失效,这是否意味着或孕育着新的理论学派的诞生,有待时间的验证。

而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实现针对中国问题的“本土化”,但一方面现有理论本身处于困境,另一方面要将现有理论改造甚至重建来适用于中国经济现实,所需绝非一日乃至数年之功。而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与转型场景的纷繁复杂也使得理论创新完全跟不上实践的推进,更使得对于现代理论构建非常重要的实证检验工作在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双重孱弱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展开。在此意义上,中国经济学处于一种双重困境之中。

现实经济的各种问题不仅对经济学理论形成挑战,更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相对而言,在成熟市场经济中,由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对成熟和政策研究的相对深入,政策工具箱的内容较为丰富,政策制定者有着较为坚实的理论根基,对于政策效应的预估也相对较有把握,且政策的适时调整也能使得其实施效果较为符合政策目标。

而中国在过去 30 余年中,虽然由于同时面临着推进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改革与发展同步推进情况下的政策制定本身具有更大的难度,但更大的难度来自经济转型环境下理论指导的匮乏和政策制定较少可供参照的经验。因此,对应于经济学理论的困境,中国的政策制定也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

如何打破困境?在一般意义上说,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政策制定,可能的方向不外是: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以现有的各种理论和政策经验为基础,尽管主流经济学本质上建基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并不完全适用于转型经济的环境,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推进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经济体系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日趋强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将中国经济中一些关键的独特因素纳入分析,不仅包括纯粹的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体制因素及其他国情因素,来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效果的。但这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重要,的是,要避免进入一些误区。这些可能的误区体现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

理论、现实与政策

其实,“中国经济学”的概念未必正确。从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论来说,经济学没有国界。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学基本体系的基础上,纳入那些反映中国经济特殊性的若干因素之后而形成的经济学。然而,即便对此基本思路没有异议,对于什么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学基本体系”,现有的诸多不同学派也未必能够达成共识。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理论本身的作用和理论构建的目标。

理论体系的构建必然基于对经济体系的观察,同时理论也必然是抽

象的,但理论抽象能否提炼出经济运行的本质因素,能否构建反映经济运行本质特征的合理假设,对于理论是否能够有效解释经济现实并用于指导政策制定则具有核心意义。

西蒙对新古典主流理论的批评是:“新古典理论的困境是实实在在的……新古典理论远不能充分描述工商企业的内部情况,也未能充分指明怎样借助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等工具来改进商业决策。同时无论是在理解经济整体中发生的事件,还是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基础方面,新古典理论都十分软弱无力”,尽管“新古典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对现实世界已然了解”,但“就我们所知,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极其贫弱……在经济学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世界,同如何制定政策、个人如何做决定的世界打交道”。^①西蒙的批评直击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设——理性人,而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假说显然更为接近现实世界的真相。

现有理论的困境不仅来自其不合理的理性人假设,还来自其对于经济系统内在结构特性的无视。经济系统至少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微观、产业和宏观,三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呈现出一些重要的结构特性。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将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各自独立,很大程度上引发出对经济系统认识的误导,进而引发出理论的局限性并使得政策制定进入误区。在微观层面,主流经济学关于消费者的理性假设已然受到行为经济学的极大挑战,其关于企业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则未给创新行为留下什么空间;在宏观层面,基于简单加总而成的宏观经济指标淹没了大量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信息和结构性问题的信息,可能导致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并引发严重的政策失误;产业层面的结构问题恰恰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却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中几乎消失。就此来说,我们需要借

① 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27、32页。

鉴的绝不仅仅是主流经济学。由此,每每阅读宏观经济学论著,我都会质疑所有“规律”的微观基础何在,其微观基础又是否足以为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提供依据和支持?每每阅读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进一步的质疑则是,其背后是否存在经得起检验的理论假设,其理论的渊源何在?每每见到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与实证检验,则又往往会质疑,其结构划分的合理性何在,作为其微观运行基础的机制如何,其对于政府政策及其效应又隐含着怎样的前提假设?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米塞斯指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学的一个分支”,“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人有意识地行动。人是行动的动物”。^①米塞斯又强调,作为整个经济学体系,这一公理为之后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基础。在把握了行动这一概念时,“我们同时把握了价值、财富、交换、价格和成本这些紧密相关的概念。在行动的概念中必然暗含了所有这些概念,而且与这些概念一起还有评价、价值的范围与重要性、稀缺与丰富、优势与劣势、成功、利润和亏损这些概念。在系统地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进行推导时从逻辑上阐明所有这些概念和范畴,以及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关系,构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第一项任务”。^②

以此为出发点,有必要反思,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上存在怎样的问题。即使以“有限理性”为出发点,也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经济中的人该如何划分为不同群体,而相关群体在个人行为特性基础上又可能产生怎样的群体行为,这些行为对于经济运行和政

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85、8 页。

②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策实施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此而言,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不仅包括消费者群体、劳动者群体、企业家群体、投资者群体等,还应包括政府政策制定者群体和政策实施者群体。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则更有必要分析,在中国经济环境下,人的行为,即作为消费者的行为和作为企业家的行为,特别是作为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都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这些行为特性又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政策效应带来怎样的影响。

进一步,作为宏观经济运行微观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主体和决策主体的行为,还应包括微观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相关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的安排和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等,都对经济主体的决策空间产生影响,而市场运行的机制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不同主体之间或不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怎样的市场结果。

以拉弗曲线为例。拉弗曲线在供给学派中具有核心地位,本书的第2章就此做了详细介绍。从理论上来说,其建立在消费者理性行为和企业对于税收政策反应的理性决策基础之上。而就政策效应来说,其在一个具体的经济体中是否成立实际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但反过来,在实证结果背后起到决定作用的则是这一经济体在微观层面的主体行为、微观机制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在当前情形下,在中国,减税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可能并不可乐观。就消费者来说,当边际税率降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将如何改变?显然,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会有不同反应。若以房奴作为一个群体,当其收入增加,可能的选择是尽快把房贷还清,因此,这类消费者的其他消费都不会增加。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减税无疑带来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但对于他们的消费行为具有更大影响的或许是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对于企业来说,在中国,两类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行为存在巨大差异。国有企业固有的预算软约束迄今并无实质性改变,其经营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税收的影响?私营企业的投资今年初以来大幅度降低,会因为减税而增加投资吗?当几乎所有企业都介入了房

地产行业,而今年第一季度又频频出现央企“地王”的情况下,预期因减税而刺激新的实业投资岂不是缘木求鱼?

以此观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不过是鸡同鸭讲。哈耶克强调的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经济运行机制上,而凯恩斯主义强调的主要是政府有必要在宏观层面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凯恩斯说哈耶克从来没有画清楚政府和市场的界线,而实际上其争辩的焦点或许应该是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依赖有效的微观机制作为其必要前提和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效应

一般均衡理论似乎覆盖了所有市场,也就覆盖了所有行业,但本质上不过是单部门模型在形式上的扩展,完全无法体现部门特性和部门差异,因此只能归属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从来忽略产业部门的结构问题,假设部门之间无差异,因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如何并不依赖于结构状态。但事实上,这些隐含假设都并不符合现实,特别是不符合结构失衡状况下的经济现实。

就中国现实而论,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出现在钢铁、水泥等行业,其动因在于过去十多年汽车、住房需求的急剧增长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及近两三年在需求接近饱和下的快速衰减。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继续以增加政府投资来维持高增长已然没有什么空间,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制造业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正在垮塌,而自主创新的能力则在短期内无法培育并生效,因此其投资回报难以吸引资金进入。这就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很难达成其目标。事实上,无论降息、降准还是公开市场操作,所增加的货币供给究竟去向哪个部门并不是央行能够完全控制的。即

使采取了所谓定向措施,但金融市场并不可能被完全分隔,商业银行无论大小都不愿意承担中小企业经营风险,这种定向措施的效果必然是相当有限的。

所谓结构,最粗略的划分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分法,而在此划分下的结构失衡恰恰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房地产行业几乎完全“金融化”而实体经济无利可图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资金“脱实向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放水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将中国经济引向悬崖而完全无助于结构失衡的解决。

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

供给与需求互为前提,缺一则市场无存。在微观层面如此,在宏观层面亦如此。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缘于大萧条下的供给过剩,因此需求侧管理较为有效,实际上是以供给能力无约束为前提;反之,供给侧管理的理念是基于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但事实上是以需求方的购买力和需求结构并不构成约束为前提,如果需求方无购买力或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完全不匹配,则必然带来供给过剩,供给又如何能创造需求?

进一步,以时间为视角来考察供给和需求在调整周期上的差异,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政策效应来说,无论是减税对于消费的影响,还是通过投资拉动 GDP 增长,都较易在短期见效,因而需求侧管理属于短期行为。因此,凯恩斯所说“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确有其道理。相比之下,生产能力的增长或削减,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育,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而供给侧管理属于长期行为。尽管去产能表面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由于涉及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以及对于失业影响社会稳定的顾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实际上需要更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无论需求侧管理还是供给侧管理,以政府直接干预的形式加以推进显然已经完全不具备可行性,而是必须主要依赖微观主体的行为。那么,对于供给侧调整来说,长期调整成功推进的必要条件是行为主体具有长期视野且追求长期的投资回报。就中国当前状况来说,无论是企业经营者群体还是政府官员群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群体,其中有多大比例真正具有长期视野并追求长期回报?本人对此无法乐观。除了既得利益的保护之外,这或许正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最大障碍。

政府政策实施的逻辑前提

在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政策制定就不免带有“拍脑袋”和“毛估估”的特征,而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就难如人意,甚至与其初衷相背离。鉴于眼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当然无法等待理论的成熟,在治标和治本的权衡中也面临困难重重的选择。但至少有一点在政策制定中是必须加以关注和考虑的,也应该加以即时运用的,即对于任何政策,需要分析其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和逻辑前提是什么。因为,政策实施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推进的微观机制,而有效的微观机制则是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前提。事实上,当下的不少宏观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之前,恐怕并没有对政策实施效应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进行其必要条件的分析。

仅举一例。有学者建议,我们仍应继续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问题是,在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要将投资落实到能够提高效率的方向或提高技术水平的方向,其投资主体是谁?投资的激励来自哪里?显然,除了基础设施,大量的实业投资主体是企业经营者,而企业经营者投资方向的选择又以投资回报为主要依据。因此,改变“脱实向虚”的趋势是上述政策实施的逻辑前提,否则就只会加剧结构失衡。

在全面综述了供给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白让让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本书对英美实践及其启示进行了归纳和揭示;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提炼出多重性结构特性——产业结构、组织结构、要素结构、技术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于“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分析;特别强调了供给侧改革的体制构建;对于产业组织政策和财税体系改革给出了重要建议,等等。这些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说,甚至对于现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都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相比于白让让所做的这些深入研究,本人所提出的若干思考只是一得之见。中国经济的实践发展太快,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政府即时应对国际、国内、宏观、微观、产业、区域等各种变化,等不得学者们花费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来重新构建整个理论体系从而提供政策指导。正因为如此,本人所强调的是一些基本的原理和规则,或许是可以直接运用的。当然,中国的长期发展仍然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有效的政策指导,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幸运。

郁义鸿

2016年8月1日

1	1 导论
7	2 供给经济学基本原理
9	2.1 滞胀与供给经济学的产生
19	2.2 供给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简介
28	2.3 减税政策之外供给经济学的其他理念
31	本章小结
34	3 供给经济学的美英实践与启示
36	3.1 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减税及其效应
47	3.2 供给经济学的“减支”实践与效果考察
52	3.3 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规制放松与市场自由化
57	3.4 供给经济学的英国摹本
69	本章小结
72	4 供给经济学的中国视角——结构性改革
73	4.1 经济增长路径升级与政府干预模式转变的宏观背景
82	4.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重性分析
91	4.3 供给侧改革与“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界定
98	4.4 机制设计与结构性改革举措的“开花结果”
100	本章小结

102	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制构建
103	5.1 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改革
119	5.2 规制放松与政府干预模式转型
122	5.3 行政垄断、政府退出与市场“确位”
129	本章小结
130	6 产业组织政策与过剩产能治理实践
133	6.1 产能过剩的主要表现与后果
135	6.2 治理产能过剩的方式与效果回顾
142	6.3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双重低效的原因分析
146	6.4 总量过剩行业“产能置换”机制的效应分析
152	6.5 结构性过剩行业的退出机制分析
161	本章小结
166	7 基于结构性减税的财税体系改革
167	7.1 财税体制、税率结构与企业负担
177	7.2 公共财政建设与结构性改革
187	7.3 结构性减税——中国的逻辑与实现模式
199	本章小结
204	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瞻
205	8.1 全书主要结论
205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瞻
209	8.3 深入研究的若干设想
211	后记

1

导论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一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地说,生产者在完成他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出,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上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拿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54 页)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关于供给经济学的听闻少了,因为大多原先供给经济学支持者试图达到的目标都已达到。也就是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供给经济学最初出现时,它的许多观点带有很大争议性,但现在已被职业经济学家列为传统智慧。

——布鲁斯·巴特利特:《新美国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0 页)